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10月16日（第247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CNAS 建议美国整合其对华与对朝战略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动态越来越不稳定。美国需要一项综合的政策来与中国和朝鲜打交道，该政策应该平衡各种可能方式的风险和益处。

中美关系

荣鼎集团评估中国的经济轨迹

由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和荣鼎集团共同发起的“中国探路者”倡议（China Pathfinder Initiative）10月5日发布报告《中国探路者：年度计分板》。报告围绕金融体系发展、市场竞争、现代创新体系、贸易开放性、直接投资开放性和投资组合开放性六个因素评估了中国的经济轨迹。报告主要发现如下：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总体上向市场经济规范迈进。当前对中国进行分析的方式倾向于低估中国进行的改革努力，而强调中国政府控制的长期战略。“中国探路者”项目的基准指标表明，自2010年以来，中国在上述六个领域都取得了一些进展。

中国在一些领域的进展比较明显，例如在贸易开放方面达到了市场经济的标准。然而，在其他大多数领域，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标准仍存在较大距离。最大的不足是在市场竞争等结构性领域，在这些领域很难用既定的国际工具进行衡量和约束。

在上述六个领域中，改革、停滞和“倒退”同时发生：中国在商品贸易上开放，但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仍相当“封闭”；中国政府已着手放开一些对内投资组合流动，而对外投资流动的壁垒仍然很高。此外，最近的政策信号与市场导向不一致，包括国有制复苏和法律管辖之外的影响，“侵蚀”企业使用国内外资本市场的自由，以及国家规划者对未来市场结构的过度影响等。

美国如何应对北京的央行数字货币雄心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近日登载其网络政策项目和亚

洲项目非常驻学者罗伯特·格林尼（Robert Greene）的文章称，随着世界各国都在考虑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利与弊，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现有跨境支付渠道效率低下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基于数字货币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如果能够实现，这些安排会使中国企业及其贸易伙伴减少在跨境交易中使用美元，并降低美国制裁的效力。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支付基础设施中的主导影响力，美国应采取以下措施应对：

第一，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研究中国成功在海外建立一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安排可能产生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并与盟友合作，确保多边央行数字货币安排的建立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应寻求更好地理解美国公司如何参与海外多边央行数字货币安排的发展。

第二，加快努力降低现有大额跨境支付渠道效率低下的问题。现有跨境支付渠道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用来处理大额支付的系统在某些工作日和周末大部分时间关闭。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华盛顿应投入更多资源，使纽约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运营的实时全额结算资金转帐系统 FedWire 每周 24 小时开放。

第三，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考虑监管改革，允许私营部门就旨在改善涉及新兴市场的美元计价交易的跨境支付渠道进行更大的创新。一种政策选择是扩大美国非银行机构对数字化的美国央行债务的使用权，以允许在代理银行服务不足的市场中发展负担得起的高速美元支付解决方案。随着美国探索发行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收益，政策制定者还应该研究，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美元与在海外发行的用于企业间支付的央行数字货币进行低成本的、有效的交换。

美学者分析戴琪 CSIS 讲话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10 月 4 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表重要讲话, 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 包括她将与美国高层展开对话, 讨论中国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该协议未涉及的相关产业政策的问题。她还强调, 美国正通过加强国内投资, 以及与盟友进行更多协调来使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处于更强的地位。该智库多位学者对戴琪发言和未来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发表了看法。主要观点如下:

该中心高级顾问、中国商务和经济项目主席甘思德 (Scott Kennedy) 认为, 就整体来看, 戴琪认为中美经贸脱钩是不现实的, 应该“再挂钩” (recoupling)。但她的发言并没有触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具体细节。保持谨慎的好处是, 她可以在如何与中国展开协商方面保持灵活性, 不放弃第一阶段协议取得的成果, 如果协商不成功保留任何可能的惩罚。模糊表态的弊端是, 这会使一些商业团体、工会和盟友对现在和未来的情况充满不确定。模糊的表态也会给北京这样一种印象: 这代表双方回到广泛的对话, 北京可以高枕无忧。他认为, 短期内中美经贸关系将维持现状, 但未来会面临更多限制, 如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和关税。

该中心研究员、中国商务和经济项目主席伊拉里亚·马佐科 (Ilaria Mazzocco) 认为, 戴琪的发言反映了拜登政府重视提升国内竞争力, 以及与国际伙伴合作的承诺, 但缺乏细节。现在仍无法了解与盟友合作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美欧经济关系的某些领域仍比较紧张。一个潜在的冲突领域可能是继续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采购承诺。这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包括美国的盟友。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中还有很多有待解决的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例如, 为了帮助国内新能源产业, 拜登政府不会豁免对中国的太阳能光伏板的关税, 但如果拜登政府认

真对待其近期气候目标，它不得不依赖进口，包括从中国进口。

荣鼎集团高级合伙人及创始人荣大聂 (Daniel Rosen) 认为，观察者希望戴琪的发言能够清楚地阐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特别是如何与其他市场经济体加强合作。但她的讲话着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说明她仍强调通过双边方式来解决贸易问题。

普华永道董事总经理珍妮特·朱 (Jeannette Chu) 表示，拜登政府希望维护第一阶段谈判成果，并且愿意与中国保持接触的想法是积极的。但戴琪的发言未涉及拜登政府的“全政府”对华战略。她认为，从出口控制和国家安全政策的角度来看，一项围绕“全政府”战略的真实计划将是非常有益的。

美国外交政策是否对中国敌意过重？

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敌意是否过重？关于这一问题，《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杂志近日询问了 68 名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其中 31 名学者不认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敌意过重，10 名保持中立，27 名认为敌意过重。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摘要如下：

不认为敌意过重的专家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 (Aaron L. Friedberg)：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在这一点上，对美国来说，应对不足的风险仍然大于应对过度。

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肯达尔-泰勒 (Andrea Kendall-Taylor)：令人担忧的不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敌意过重，而是华盛顿过度关注中国、忽略了其他挑战。华盛顿还要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美国盟友都希望采取对北京高度对抗的策略。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拜登政府的政策不是要阻止中国的崛起，也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要阻止中

国抢占在地区或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Evan Medeiros）：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愤怒的、崛起中的大国，美国需要运用巧妙的竞争战略来应对。这将不可避免产生摩擦。美国不仅要习惯这一点，还要明智地使用这些策略。

密歇根大学教授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上一届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管理不善，但是总体上来说，采取更加“敌对”的政策并不是一个错误。

认为敌意过重的专家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既然美中两国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给对方带来的挑战上，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措施来管理两国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斯普林格（Cecilia Han Springer）：考虑到全球面临的气候挑战，美之间没有时间来增加对彼此的敌意。两国可以开展健康的竞争，动用自身的科学、政策和技术专长，以实现共同的全球目标。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两国之间的敌意正在将他们引向更激烈的冲突，这太可悲了。

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阿什福德（Emma Ashford）：过去几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充满敌意。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可能会使得基本的外交事务都变得更难。对中国的公开敌意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还会增加对抗或冲突的可能性。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何理凯（Eric Heginbotham）：虽然美中关系有内在的竞争因素，但是双方也可以而且应该在一些领域合作。但是现在双方的竞争因素似乎成了美国政策的唯一焦点。《台湾旅行法》和拟议的《台湾强化法》等举措破坏了与中国的外交基础，是对中国不必要的挑衅。

美国外交

美欧需振兴双边贸易关系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 (Chad P. Bown) 近日撰文称, 美国和欧洲需要弥合双方在贸易、投资和技术等方面的分歧, 重振双边贸易关系。文章摘要如下:

从表面上看, 美国和欧洲在贸易、投资和技术方面的关系似乎很牢固, 但国内政治的需要鼓励各国领导人攻击其他国家, 并关注贸易不对称。经历了无疾而终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 和动荡的特朗普政府时期, 自拜登上任以来, 美欧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其中最重要的是拜登 6 月访欧期间宣布成立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 (TTC)。

美欧可以利用该委员会开启跨大西洋政策合作的新时代。双方都认为, TTC 不会是奥巴马时代 TTIP 的失败重演。双方官员避开了那些有争议的话题, 如转基因食品和关税等。十个工作组覆盖了一系列重要问题, 包括人工智能, 5G 和医药供应链等。

在人工智能方面, 美国和欧盟致力于共同开发护栏, 促进创新, 并确保技术被负责任地使用, 尊重共同价值观和人权。但是, 双方并未就任何共同的框架或监管技术的标准达成共识。双方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有可能沦为没有任何具体承诺的意见交换。

随着美国重返《巴黎协定》, 美欧贸易关系也需要适应气候政策的变化。欧盟今年 7 月份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 将对来自尚未征收国内碳税国家的碳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这一提案将伤害美国对欧洲的出口。美国和欧盟官员可以利用 TTC 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彼此实现各自总体减排目标的方式, 而不让战略上的微小差异演变为贸易冲突。

美国需重新思考其在非洲的战略

《外交事务》杂志 10 月 8 日登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非洲项目负责人乔恩·特敏(Jon Temin)的文章称,非洲的人口、经济和政治状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扩大了美国积极参与非洲的机会,也凸显出了将非洲列为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必要性。未来数月内,拜登政府应该制定一项更加突出的非洲战略。

首先,重新思考非洲大陆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结构。大多数美国政府和机构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区分开来,后者被视为泛中东的一部分。但这一做法越发不合逻辑。将整个大陆视为一个整体将有助于整合各机构的努力,帮助官员们从全局角度应对挑战,如移民和恐怖问题,这些问题跨越萨赫勒和撒哈拉地区。

华盛顿还应该重新构建对非洲的地缘政治理解,特别是非洲国家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联系。未来政府应通过加强各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将红海两岸事务提升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优先事项。

其次,拜登在竞选时承诺将价值观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为了在非洲坚持这一承诺,拜登政府应专注于加强机构而非同个别领导人保持关系。应该实施一项基于共同价值观的针对非洲的长期战略,并将该战略贯彻到底。这意味着在出现与非洲主流民意相背的决定时,要抵制让短期利益驱动维持现状的诱惑。

最后,加强非洲在全球议题中的声音。当前,气候变化、技术问题、移民等对全球举足轻重的对话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美国应推动让更多非洲人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全球机构中获得领导地位,真正倾听非洲人民的意见。例如,“二十国集团”(G20)只有南非一个非洲国家,应该将尼日利亚纳入进来。在拜登即将举行的“民主峰会”等特别会议上,应邀请非洲民主领导人参与,并把他们放在突出位置。

CNAS 建议美国整合其对华与对朝战略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动态越来越不稳定。美国需要一项综合的政策来与中国和朝鲜打交道，该政策应该平衡各种可能方式的风险和益处。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 10 月 7 日登载了其印太安全项目研究员雅各布·斯托克斯（Jacob Stokes）执笔的报告称，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动态越来越不稳定。美国需要一项综合的政策来与中国和朝鲜打交道，该政策应该平衡各种可能方式的风险和益处。

报告为美国如何整合其对华和对朝的外交战略提出了四项建议：

第一，塑造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关系。美国应该认识到，朝鲜半岛在美中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挑战和朝鲜威胁往往交织在一起，因为无法将二者真正区分开来。朝鲜是一个重要的地区热点问题，可能升级为中美之间的冲突。鉴于北京愿意无条件参与，美国应恢复与中国文职和军方官员的对话，以便更好地应对朝鲜半岛突发的紧急情况，避免意外升级。由官员和外部专家参与的“1.5 轨”外交，以及非正式会议的“2 轨”外交都能成为官方外交的补充渠道。

第二，使朝鲜参与政治和安全议题。美国需要明确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外围边界，以安抚韩国，并提高与朝鲜和中国进行建设性外交的前景。美国不仅要保证不会对朝鲜发起预防性的“流鼻血”攻击，还要重申美国对美韩同盟的持久承诺。继续就朝鲜问题与北京展开高层外交，就双方的共同利益寻求合作，但拒绝与其他议题联系起来。支持中国使用其对朝鲜的杠杆，包括经济、金融、能源及外交领域的压力点，以对朝鲜的核和导弹试验

进行约束。提议重启由朝鲜、韩国、中国和美国参与的“四方会谈”，在会谈中优先将降低风险和军控作为短期目标，并重申稳定威慑符合各方利益。

第三，在该地区性推动稳定威慑。在不损害朝鲜最终无核化可能性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理解并应对朝鲜核武库对美国延伸威慑的影响，以减轻韩国和日本的安全压力，防止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和渠道寻求核武器。效仿北约成员国使用的模式，建立一个东亚核规划小组，以共同评估该地区核战略和兵力态势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并就未来的计划建立共识。该小组最初成员国应该包括韩国、日本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盟友可以随后加入。加强韩国的常规威慑能力，继续就扩大战区导弹防御，包括中短程常规导弹、火箭和火炮等进行磋商。

第四，与韩国协调一项共同的半岛政策和外交政策。与韩国就其对华政策进行接触，并将此与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一愿景整合起来。应该确保“四方安全对话”（Quad）及“七国集团”（G7）等在内的多边或单边机制处在开放和包容的状态，即使韩国不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只要它在特定领域有政治意愿，就能够参与其中。在发展多边倡议来应对中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胁迫时，美国需要考虑韩国的情况，因为中国有可能再次将韩国作为目标。

美专家为美国新国防战略建言

美国 War on the Rocks 网站近日登载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防中心主任托马斯·斯波尔（Thomas Spoehr）的文章称，拜登政府正在制定的新《国防战略报告》应该理解正在快速扩展的全球威胁的影响，评估美国的核心战略目标，并明确国防部需要哪些

能力。文章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先考虑核心利益和目标。新的国防战略应明确军方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国土，同时防止和击败侵略或军事胁迫。虽然此前的战略可以依赖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反抗所有潜在的对手，在技术扩散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国防部领导人应将重点放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最强劲的对手上。战略家应该使美国军队的角色和任务与这些不断进步的对手相一致，并避免将国家问题与国家安全威胁混为一谈。

第二，如实评估日益增长的威胁。2018 年的《国防战略报告》确定了五大威胁：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恐怖组织。从那时起，这些威胁的严重性日益增长而非降低。新《国防战略报告》应明确国家安全目标，客观地评估对这些目标的威胁，并对威胁进行优先排序。

第三，专注有效威慑。除了国土防御，威慑中国和俄罗斯的“入侵”可能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新的报告应更详细地说明美国计划如何威慑中俄，集中关注如何发展和使用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阻止和击败敌人的行动。

第四，为了支持威慑中国和俄罗斯“入侵”的努力，美国军队应该在关键地区——特别是印太地区——建立加强的前置防御态势，而不是等到以后。鉴于北京强大的军事实力，西太平洋已成为美军的竞争之地，美国亟需加强其和盟友沿第一岛链预先部署的军事能力。为了阻止莫斯科的侵略，美国应该加强北约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的前置战斗力。华盛顿还应推动北约盟国尽可能地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国防部应提供北约盟国无法提供的前置部署能力。

第五，以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待盟友。中俄的安全合作和强劲的军事现代化项目，进一步凸显盟友的必要性。新《国防战略报

告》应强调通过军售和转让、联合演习、新的海外基地协议、技术共享和国际培训来建立强大的伙伴关系，在印太地区重点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和台湾地区的关系。但盟国的重要性应与考量其军事能力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各国政府有各自的安全利益、内部政治动态，其威胁感知受到受到能力的限制。

第六，承认应恢复美国的常规威慑和战略威慑。在战略威慑方面，美国及其盟国领导人需要现代化的核三位一体，以增强抵御拥核对手侵略的信心。在常规威慑方面，美国军方应利用电磁战、网络作战、远程精确射击、分布更广的有人和无人部队，以及更高效的新作战理念，降低中国或俄罗斯对成功的信心。

美国政治/其他

美国应重新审视产业补贴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2021 年 9 月 27 日登载该中心繁荣与发展项目非常驻高级顾问吉尔伯特·卡普兰 (Gilbert B. Kaplan) 的文章称，一直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政府对私人企业的补贴有悖自由和公平贸易。但美国现在应该重新审视产业补贴。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参议院近期通过了两项拜登政府支持的新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CA) 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Bill)。这两项法案总计将提供约 1 万亿美元，用于发展人工智能、5G 通讯技术、半导体、生物技术以及桥梁和管道、铁路和公交车、低成本宽带等。这可能导致政府直接或间接向私人公司支付前所未有的大额资金。

这些项目是必要的，代表着美国补贴和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当外国政府使用补贴手段，动摇美国工业和技术领先地位时，美国通常有三种应对措施：第一种是对接受补贴的公司或给予补贴的政府提起贸易诉讼。但该方法存在许多问题，如贸易法规的补救措施无法覆盖所有行业，通过世贸组织等国际平台追责难度大。第二种是与外国达成协议来限制补贴，但收效甚微，而且难以执行。第三种是大力投资美国关键行业，以对抗外国补贴。这种新方法也为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和执法者带来了问题：如果美国大举投资产业发展，那么它如何在贸易谈判和贸易案件中反对重大补贴呢？

文章认为，美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回应外界的不满：一是世贸组织等国际协议无力应对大型非市场经济体及其补贴。因此，美国努力改革协议的同时，也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二是根据国际公认的定义，美国的许多投资项目可能不属于非法或可起诉的补贴。三是就国际贸易而言，这些补贴可能不会引起“损害”，因为其旨在增强美国的就业基础和国民经济，而不是出口表现。

美国应建立国内清洁能源技术供应链

美国进步中心（CAP）网站 10 月 4 日登载该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威廉姆斯(Mike Williams)等的文章称，全球对清洁能源技术相关材料 and 产品的需求将在未来几年将呈指数级增长。美国应在国内获取和制造这些原料和产品，而不是主要从海外进口。未来十年为美国将清洁技术的制造供应链带回国内提供了最佳时机。

文章建议美国使用投资抵税政策帮助构建国内可再生能源供应链。这能够创造优质就业机会，有助于振兴中产阶级。制造

业对整体经济也具有重大影响。分析表明,即使不考虑下游产出,制造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1%以上。如果考虑制造业经济活动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以及下游环节,制造业的整个价值链约占美国 GDP 的三分之一。

这符合美国的气候和正义目标。在清洁能源材料生产环节,为了将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让劳动力得到体面和尊重的对待,最好的方式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国内生产相关材料。

这也是确保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关键。尽管提供刚好满足预期市场需求的商品能够在日常运作中带来成本优势,但在经济和政治危机时期会暴露出脆弱性和不可靠性,带来巨大风险。美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审查那些对国家利益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增加其供应余量,提高弹性,以确保突发事件不会危及事关美国政府和人民安全、保障和舒适的商品。

当分配公共资金来支持某个行业时,应该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良好的就业机会、清洁的环境、能源和国家安全符合拜登总统“重建更美好未来”的愿景。美国人也不应忽略投资国内设施以建立产能需要时间,但这种重组和新投资也并非史无前例,如企业在疫情期间迅速转型生产个人防护用品。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MEP)和《重建更美好未来法案》也能够在这方面提供支持。

美应重构其在多边发展机制中的领导力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近日刊登其繁荣与发展项目研究员丹尼尔·朗德(Daniel Runde)等联合执笔的报告称,过去 30 年来,美国在多边机构中的领导力一直在下降。报告就如何提升美国在多边组织中的领导力提出了五项建议:

第一,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方针来参与多边机构。美国应该

优先考虑那些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相一致的多边机构，如安全、气候变化、数字化、疫情、人权、反恐和反扩散。报告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建立“多边政策委员会”来协调美国政府各机构对多边机制的战略方针。该委员会应该由副国家安全顾问领导，负责协调国内政策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确保多边政策战略与其他国内及外交政策目标一致。

第二，国会应该批准多边政策委员会在美国政府机构间开展多边援助审查。多边政策委员会可以利用这一审核机制为美国的多边体系战略提供信息，并优先考虑资助跨机构的任务。国会还能通过评估使美国更广泛的利益保持一致，并在这些机构中推动改革，使其运作更加透明、负责任和高效。

第三，为美国进行多边参与制定一份全政府实施计划。为了更好地实施多边战略，多边政策委员会将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指导，协调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参与。委员会的任务包括：追踪并优先考虑即将面临换届的领导和高层职位；招募并储备能胜任各个层面职位的美国人；监督候选人竞选的过程。

第四，美国应该针对不同的多边机构，制定具体的方案，与盟友一道提升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例如，在国际金融机构（IFI）中，美国可能不能完全控制投票，但能通过其在其他地方强大的影响力来建立强有力的联盟，激励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与之合作。在联合国，美国可以利用其与日本、印度及澳大利亚的特殊关系，与这些国家进行更多合作。

第五，在各层面发现、吸引及配置有能力且多元的美国人员。美国应调整外交部门内部的激励机制，鼓励人员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积累多边经验。美国应关注其在多边机构中的人员足迹，鼓励年轻且有能力的美国人在国际组织中寻求职业发展，提升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话语权。

美国人如何看待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10月7日发布研究报告《美国人如何看待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报告认为，美国公众对促进国外的人权和民主并不像政府宣称的那样感兴趣。数据似乎也驳斥了支持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些假设，即美国人对贸易持怀疑态度，对美国的全球参与和领导地位持谨慎态度。报告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美国人支持关注改善国内状况。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维持美国国际影响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关注国内。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改善公共教育（73%）、加强国内民主（70%）、减少种族（53%）和经济不平等（50%）对于维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美国人还将保持美国的经济实力（66%）和军事优势（57%）视为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第二，美国人认为中国正赶上美国。美国人普遍担心与中国的竞争，与两年前相比，他们对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信心明显下降。多数（40%）美国人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比美国更强大，高于2019年的31%；只有约四分之一（2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更强大，低于2019年的38%。首次有不到一半（46%）的人认为，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比中国更强大，低于2019年的58%。

第三，美国人普遍支持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促进美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大多数（58%）美国人现在表示，两国之间的贸易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高于2019年的33%。在另一个问题中，多数人（62%）支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大幅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为了在发展新兴技术方面与中国竞争，美国官员提议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直接公共投资。美国人普遍支持这种做法。8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为新兴技术的研发提供资金，

以使美国企业在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七成受访者（72%）支持为与受到外国政府支持的外国企业竞争的美国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第四，政府低估了公众对贸易的支持。创纪录的美国人（68%）现在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有利，近四分之三或更多的人认为国际贸易有利于消费者、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美国科技公司、美国经济和美国农业。这种对国际贸易的支持来自各个政治派别。

第五，美国人坚定支持美国继续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大部分公众（56%）认为，维护美国的全球角色利大于弊。公众还希望美国在防止核扩散（76%）、打击恐怖主义（67%）、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新冠疫苗（62%）和遏制气候变化（58%）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人不想独自承担这一责任：绝大多数人（69%）支持共同领导的政策，而不是寻求美国的主导地位（23%）。

第六，虽然支持从阿富汗撤军，美国人仍然依赖美国军队。57%的美国人认为，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大多数人还认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增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维持或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78%）、非洲（73%）、拉美（73%）、欧洲（71%）和中东（68%）的军事存在。此外，美国人一如既往地支持派遣美军在一系列情况下保卫盟友和伙伴。

虽然美国公众支持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复兴，但拜登团队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取舍。最终的问题将是，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能否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兑现承诺，为美国人民带来利益。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